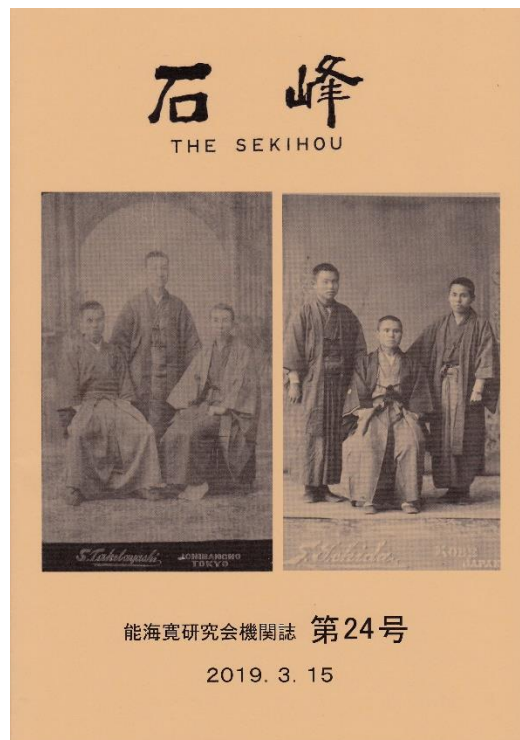


日僧能海寛収蔵の四川拓本研究

タイトル	日僧能海寛収蔵の四川拓本研究
著者名	何 大勇
雑誌名	能海寛研究会機関誌『石峰』 ISSN 1883-4183
号	第 24 号
ページ	65－81
発行年	2019.3.15
E-mail	Sekihou@hazaway.com(能海寛研究会)



日僧能海宽收藏的四川拓本研究

何 大 勇^①

前言

据日僧能海宽收藏的晚清四川拓本可以看出，四川地域保存有璀璨的唐代书法，分别有柳楷书体、王体、褚体，除柳体是真迹外，王体与褚体是江南文化的精华保存在西南的一个显示，各个集字的笔韵与笔力风格在书法价值上已经被公认，这些拓本已成为书家的藏品之宝，多不示人，碑刻拓本（片）在市场中呈高价交易状态。能海宽研究会的隅田正三先生在 2008 年公布了能海的收藏拓本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这个拓本的发表能够进一步来比对比已有的拓本，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能够贡献校勘。特别是，能海收藏的拓本中还有珍贵的四条屏风画鸟虫书，是国内初次呈现与研究，可以认为此物还在国内某地，还未知晓，期待进一步有心人来发掘，贡献于中国书法历史。除此之外，本稿还探讨了碑文中所反映的一些佛教传播文化及校勘补足已有的碑文内容。

一、关于能海宽收藏拓本的研究

日本岛根县浜田市金城町成立有能海宽研究会，出版研究刊物《石峰》。研究会公布的能海宽简历为“能海宽法名法流，号石峰。明治元年（1868）5月18日，出生于岛根县浜田市金城町长田谷村净莲寺。12岁剃度，在庆应义塾和哲学馆学习。按其恩师佛教学者南条文雄（英国留学归国后在日本首次开始梵语）的指导，发表了西藏探险论文《世界上的佛教徒》，同时学习和研究藏语及进行登山的体力磨砺。在家乡编写地方史及咏和歌，益田海域的高岛上建寺小屋。作为哲学家、探险家、宗教家追求释迦直传的《大藏经》经典，而准备出版英译经典。为此，对当时处在锁国当中的西藏进行求道，挺身于佛教巡礼探险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的有言执行和旅行准备周到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教训。在这34年的苦难生涯中，对藏文直译了《般若心经》（梵·藏·汉·英）等四卷的著作。”

能海宽在第二次1900年访问中国时，入四川，在成都得到了7副碑文拓本。能海宽研究会认为“一个世纪前的拓本，作为能海宽请来品必须好好进行保存。”虽然该研究会还未全部判别拓本的意思，但把其作为重要的物件进行保管与收藏。

能海宽研究会的隅田正三先生2008年在《石峰》第13期上发表《能海宽带回的中国四川省拓本》^②，文中指

^① 作者简介：何大勇（男），中国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un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Ethnic Studies, China. Phd, Professor.

^② 隅田正三，《能海宽带回的中国四川省拓本》《石峰》（2008（13）：31-36，日本能海宽研究会。

出把这些拓本刊登在本杂志上，仅仅只对《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和《大峨眉山永藏明华寺新建铜殿记碑》进行了解读，其他还未展开解读。他希望广泛地把信息提供给研究者来展开深化研究。从公布的碑文拓本来看，说明能海宽搜集的碑文拓本有重要的书法价值和传承价值。“能海宽请来的碑文拓本，一共有4种7张，分别为一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约1,000字左右），拓本尺寸为高268.5cm，宽139.5cm的超特大拓本。二是峨眉山的《永明华寺新建铜殿记碑》（王疏宗撰，王羲之的集书）和《普贤金殿记碑》（褚遂良的集书）的2点。尺寸上高135.0cm，宽81.0cm，是万历31年（1603）的碑文拓本。之后的一点是4幅组件的拓本，每一幅大小尺寸高113.3cm，宽32.5cm。笔墨不同的字体画得像图画文字一样，非常罕见的拓本。能海宽的记录中把其标注为珍贵。“这四幅碑文能海宽当时也未能判别是何意？只知是珍贵的作品。能海宽研究会也未能识别，在这四幅下注“关于这个拓本，知道详细情况，请告知研究会事務局。”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中国金石总录》（www.ch5000.com.cn）数据库中，《唐元和四年诸葛亮祠堂碑》原石高326.5厘米、宽159.6厘米。拓本尺寸为拓纸高281厘米、宽140厘米。叙录中注明首题下刻明成化、弘治年间滕嵩及荣华跋，尾刻清康熙十一年三月一日罗森及宋可发跋。碑阴见《诸葛祠堂碑阴记》。清王昶《金石萃编》有考。与能海拓本比较，在拓纸高上相差12.5厘米，能海拓本要大一些，宽度相差不大。

二、《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是唐宪宗元和四年（809）立碑。有碑座和碑体云纹饰，碑高367cm、宽95cm、厚25cm。是国家一级文物。碑文字体为柳公绰楷书，竖行正文共29行，包括24大行和7小行。立碑人为地方官员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所立，时间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二月二十九日。由曾任监察御史、宰相的裴度撰文，字体为由曾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又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之兄的柳公绰所书，蜀中刻匠鲁建所刻。文章、书法、刻工均为上品，所以后世文人将其称为“三绝碑”。碑文内容是对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和功德作了评价。

隅田正三解说认为，中国的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山东近南县人。受到刘备三顾茅庐，使他成为一名军师，提出“天下三分之计”。蜀国成立后，一边辅助刘备的遗儿刘禅，一边继续挑与曹氏的魏王朝进行交兵作战。这个碑文是表彰赞颂蜀国名宰相（相当于现日本总理大臣）诸葛亮（孔明）的，最初是元和4年（809）2月29日在成都城内建设了“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此后，为祭祀刘备建立“汉昭烈庙”，把武侯祠堂移到了现在的殿

堂，此地是清康熙 11 年（1672）3 月 1 日重建的。当初的碑文是为小一些的碑文，碑中有数处有插入记述，传达着历史信息。“武侯”是谥号。

成都武侯祠的建立历史，南宋时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方輿胜览·卷 51》载：“武侯庙在府西南二里，今为乘烟观。……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桓温伐蜀，夷少城，犹存孔明庙。”说明修建孔明庙最初为民间社会所为。后李雄称王开始，有了政治意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九》载：“永兴元年（304）冬十月，杨褒、杨珪共劝雄称王，雄遂称成都王。”说明孔明庙的认可是在 305 年。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 1·名胜记第 1·川西道 1·成都府 1》又载：“方輿胜览云，武侯庙在府西南二里，今为乘烟观，孔明表云薄田十顷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后封武兴王庙至今，祠祀不絕。寰宇记云，诸葛亮相蜀筑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号曰读书台，在章城门路西今为乘烟观，杜光庭录异记云，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有古井。”南宋魏了翁（1178-1237）《鹤山集·成都府朝真观记》载：“观西偏为诸葛忠武侯祠与读书台。故老相传为武侯故宅。”孔明庙、武侯庙、武侯宅到武侯祠的称呼变化，说明民间到国家的合一认同演变。明蜀献王朱椿在洪武 23 年（1390）把刘备庙与武侯祠进行君臣合庙重建，清康熙 11 年（1672）再次重建，成为今天的武侯祠。另外，根据郭清华的研究，全国武侯祠的修建历史而言，勉县武侯祠是唯一由皇帝下诏修建的，勉县的称为“天下第一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第二。^①说明诸葛武侯祠堂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块圣地。

今天的成都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门武侯祠大街，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1961 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成立博物馆，2006 年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08 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唐“三绝碑”、清“攻心”联为参拜人所喜欢。青石碑《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唐裴度撰，柳公绰书）位于武侯祠大门至二门之间东侧的碑亭中，有玻框罩护对碑体进行保护。在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 1》载：“云先主庙碑，贞元四年，苏端撰又云，昭烈庙有裴中立，武侯碑柳公绰书。”北宋姚铉（967-1020）编的《唐文粹·卷 55 上》中收录有该碑内容，为 1042 字。但未收录跋语的小字内容，说明这些题名、跋语是后人添加和补镌字体。谭良啸指出唐碑上的题跋总计有 15 则，以朝代分其中分别为唐代 3 则，宋代 6 则，明代 4 则，清代 2 则。以内容分题识 6 则，题诗 4 则，题名 5 则。这些题跋丰富了唐碑。目前武侯博物馆只收藏有三绝碑的清代拓片，尚未征集到明代或更早一些的拓片，要比较认识唐碑复刻前后在书法艺术上

^① 郭清华，《武侯墓祠匾联集注》，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13：28。

的差异有困难。^①1992年《文史杂志》(A1期)附录有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但也未见收录跋语的小字内容。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王晓乔研究员通过进一步研究题名、跋语指出以前的研究者多注意对该碑正文的研究，而忽略对这些题跋的解读，这些题刻已成“三绝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②王晓乔文中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收藏品(图1)与能海的收藏品比对，视为同一物品，但从末尾“镌字人鲁建”之“建”字比对，能海的收藏品显得更为清晰，相对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收藏品不那么清晰。能海的光绪收藏品可以成为众多拓本中的一个比对品。

有关该碑碑阳拓本，根据李兆成的研究，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就保存有约20种，分别有整张和剪裁粘贴裱装成字帖的裱本。流散于社会的拓本暂无法确估，拓本流散较广，是因为清代及近代时，本碑并未如现在装有玻框保护，从游记等文献资料看，彼时游人可以随意自行拓碑，同时守庙的道士也曾有拓碑出售拓本之举，其中专门用于拓制来供出售拓本而复镌的碑刻如清乾隆《蜀相》诗碑，上世纪八十年代仍存，因而不能排除道士拓制本碑出售其拓本。这些拓本分别拓制于清代的乾隆年间至今的近三百年间(笔者所见拓本中尚无早于清代乾隆之前的)。对于研究本碑的沿革而言，最重要的是拓制时间较早的一些拓本。今存本碑较早的拓本，如新都拓本【新都杨升庵博物馆所藏本碑拓本，新都籍人士乔先生所捐赠。碑阳南侧下部尚保留有“滕嵩题记”，位于明代荣华题记之下。拓制时间约在18世纪中期(1750-1770年间)，清乾隆中期】、馆藏朱拓拓本【拓制时间的下限在18世纪末期(1790-1799年)，清乾隆末期至嘉庆初期】等，均拓制于明代滕嵩补镌之后。^③

^① 谭良啸，《成都武侯祠的“三绝碑”》《四川文物》，1987(3)：67-68。

^② 王晓乔，《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后代题刻初探》《四川文物》，2017(4)：30-38。

^③ 李兆成，《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沿革考(一)》《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75-76。



图1 能海的收藏品（来自隅田正三，200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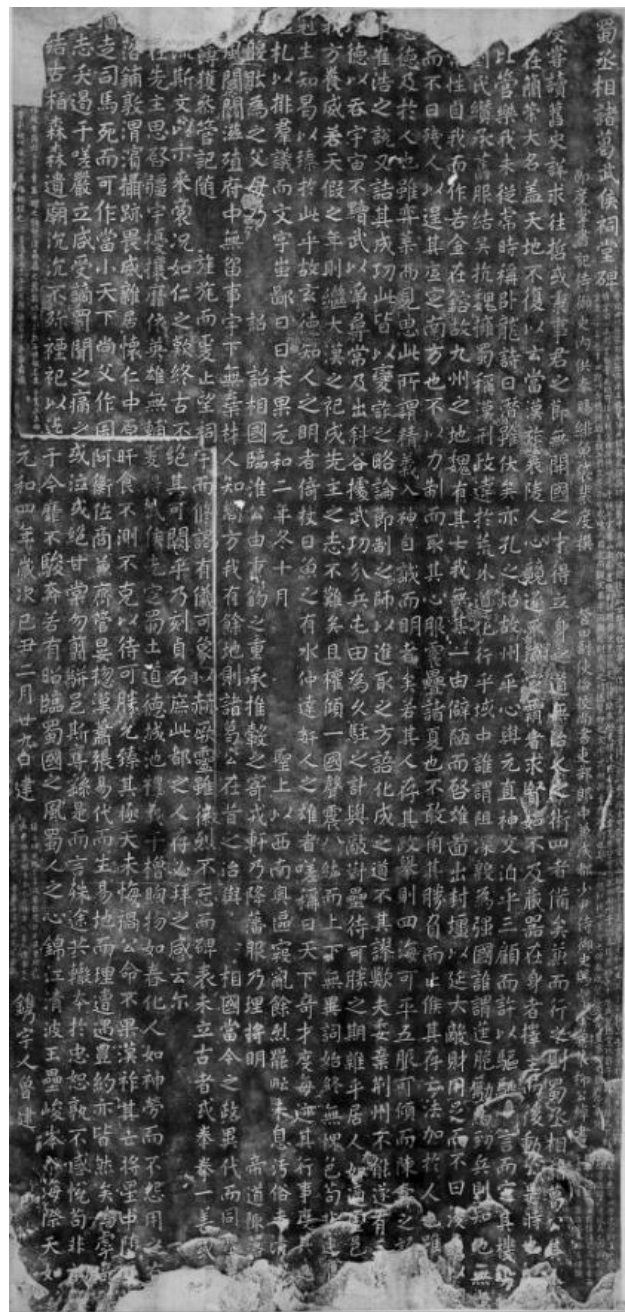


图2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朱拓拓本（来自王晓乔的图1）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节度掌书记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裴度撰 营田副使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赐紫金鱼袋柳公绰书。

予同四川按察司司宪济南王敕、莱阳曲锐观武侯庙碑，论裴中立所作，文体纯正，如《甘誓》《胤征》，不华不俚；柳子宽所书笔法遒劲，如正人端士，可敬可爱，诚二绝也。且子宽在唐元和时，与其弟公权皆以善书名于世。弟尝以笔法□对穆宗曰：“心正则笔正，笔正则可法矣。”穆宗改容，悟，以为笔谏。子宽为山南节度使，判纳贿舞文吏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诛舞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回，所以笔法各臻其妙也。中立威望德业比郭子仪，以身任天下轻重者三十年，历事四朝，以全德终始，岂独工于文字而已哉！噫！人因文而显，

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于不朽也耶。大明弘治十年丁巳仲春既望，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蓝田荣华跋。因题记残存，文字依《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七《艺文下》载录：…碑之来远矣。由唐逮今，将盈千载，日……□……间，尝过读，窃有感焉。已而询访，遂获的……□……镌补，以还其旧，庶毁壁复完，而览者无阙……□……午孟冬之吉 蜀府承奉滕嵩谨识□。①【来自王晓乔】

隅田正三的认识如下：予同四川按察司檢憲濟南王敕萊陽曲銳觀武侯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正如甘誓□征不革不□俚□予寬所書筆法遒勁如正人端士可敬可愛誠二□也且子寬在唐元和時興其□公權皆以善書名作□□嘗以華□對穆宗日心正則筆正筆正則可法□穆宗改□悟以為筆諫子寬為山南節度使判納賄舞文吏日□史犯法法在奸吏壞法亡□□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回所以筆法各臻其妙也□□望德業比耶子儀□身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獨工於文字而已□噫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 顯□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興□資格子其相興無□□也耶 大明□□十年可己仲春既望□按四川監察御史□田榮華跋

来□矣由唐□令將□載日 嘗過讀□有感為已而詢訪遂□ □□以遂其□□□□□而覽者無□□之吉 蜀府承□□謹識【来自隅田正三】

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简策，名盖天地，不复以云。当汉祚衰陵，人心竞逐，取威定霸者，求贤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择主而后动。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与元直神交，泊乎三顾而许以驱驰，一言而定其机势。繇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刑政达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谁谓阻深？殷为强国；谁为蓬脆？励为劲兵。则知地无常形，人无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镕。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无其一，由僻陋而启雄图，出封疆以延大敌。财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动而不曰残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叠诸夏也，不敢角其胜负，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於人也，虽奕叶而见思。此所谓精义入神，自诚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而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欤？夫委弃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务增德以吞宇宙，不黩武以争寻常。及出斜谷，据武功，分兵屯田，谋久驻之计，与敌对垒，待可胜之期。杂乎居人，如适虚邑，彼则丧气，我方养威。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难矣。且权倾一国，声震八紘，上下无异词，始终无愧色。苟非运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鱼之有水”；仲达奸人之雄者，嗟称曰“天

① 【清】潘时彤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七·艺文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55。

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远心，愿奋短札，以排群议，而文字蚩鄙，志愿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圣上以西南奥区，寇乱馀孽，罢眈未息，污俗未清，辍我股肱，为之父母。乃诏相国临淮公，由秉钧之重，乘推轂之寄。戎轩乃降，藩服乃理。将明帝道，陬落绥怀；溥畅仁风，闾阎滋殖，府中无留事，宇下无弃才，人知向方，我有馀地。则诸葛公在昔之治，与相国当今之政，异代而同尘矣。度谬以庸薄，获参管记，随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谒，有仪可象，以赫厥灵，虽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师长一城，尚流斯文，以示来裔。况如在之叹，终古不纪，其可阙乎？乃刻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尔。铭曰：昔在先生，思启疆宇。抚攘靡依，英雄无辅。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礼义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劳而不怨，用之有伦。柔服蛮落，铺敷渭滨。摄迹畏威，杂居怀仁。中原旰食，不测不克。以待可胜，允臻其极。天未悔祸，公命不果。汉祚其亡，将星中堕。反旗鸣鼓，犹走司马。死而可作，当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齐管晏，总汉萧张。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呜呼！奇谋奋发，美志夭遏。吁嗟严立，咸受谪罚。闻之痛之，或泣或绝。甘棠勿翦，骈邑斯夺。繇是而言，殊途共辙。本於忠恕，孰不感悦。苟非诚恻，徒云固结。古柏森森，遗庙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骏奔，若有照临。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入海际天，知公德音。元和二年，岁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三、《大峨眉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

太上在有六合，诞育蒸人，嘉与斯世，共臻极乐。遣沙门福登，齋（賁）圣母所颁龙藏，至鸡足山。登公既竣事，还礼峨嵋铁瓦殿。猛风倏作，栋宇若撼。因自念尘世功德，土石木铁，若非胜，若非劣，外饰炫耀，内体弗坚，有摧剥相，未表殊利。惟金三品，铜为重宝。瞻彼玉毫，敞以金地，中坐大士，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阁台观，水树花鸟，七宝严饰，罔不具足，不越咫尺，便见西方。以此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从现在身，尽未来际，皆得亲近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共证无上菩萨。既历十年所，愿力有加。渾王殿下，文雅如河间，乐善如东平，以四方多事，痼瘵有恤。久之，闻登公是愿，乃捐数千金，拮据经始，为国祝厘。会大司马王公，节镇来蜀，念蜀当兵侵之后，谓宜洒以法润，洗涤阴氛，乃与税监丘公，各捐资以助其经费。己，中使衔，命宣。

慈旨，赐尚方金钱，葺置焚修常住若干，命方僧端洁者主之。庀工于万历壬寅春，成于癸卯秋。还报王命，额其寺曰“永明华藏寺”。遐迩之人，来游来瞻，叹未曾有。登公谒于九峯山中，俾为之记。

惟我如来，弘开度门，法华会中，广施方便。檀相薨云，遍周沙界，竹林布地，上等色天，所以使人见像起信，而为功德之母，万善所由生也。法界有情，种种颠倒，执妄为真，随因感果，堕入诸趣。当知空为本性，性中本空，真常不灭。六尘缘影，互相磨荡，如金在熔，炉冶煎灼，非金之性；舍彼熔金，求金之性，了不可得。十方

刹土，皆吾法身。一切种智，或净或染，有情无情，皆吾法性。大觉圣人，起哀怜心，广说三乘，惟寂智用，浑之为一。然非像因生信，因信生悟，欲求解脱，若济河无筏，无有是处。故密义内熏，庄严外度。爰辟庙塔，以为瞻礼；馨洁香花，以为供养；财法并施，以破贪执，皆以使人革妄归真，了达本性而已。

登公，号炒峰，力修梵行，智用高爽，法中之龙象，山西蒲州万固寺僧也。赞曰：世尊大慈父，利益于众生。功德所建立，种种诸方便。后代踵遐轨，严饰日益胜。如来说法相，皆是虚妄作。云何大兰若，福遍一切处？微尘刹土中，尘尘皆是佛。众生正昏迷，深夜行大泽。覩面山不见佛，冥冥罔所睹。忽遇红日轮，赫赫出东方。三千与大千，万象俱悉照。亦如日春至，百卉尽发生。本自含萌芽，因法而溉润。亦如母忆子，形神两相通。瞻彼慈憫相，酌我甘露乳。唯知佛题弘，圣凡尽融摄。莹莹白毫相，出现光明山。帝网日缤纷，宝珠仍灿烂。栏楯互周遮，扃户各洞启。天龙诸金刚，拥护于后先。既非图绘力，亦非土木功。于一弹指间，楼阁耸霄汉。星斗为珠络，日月成户牖。即过阿僧劫，此殿常不毁。愿我大地人，稽首成归依。一览心目了，见殿因见性。若加精进力，了无能见者。佛法难度量，赞叹亦成安。诸妙楼观间，各有无量光。各备普贤行，填勿作轻弃。我令稽首礼，纪此铜殿碑。佛佛为证盟，同归智净海。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九月之吉。

赐进士第翰林院检讨汉嘉就鹤居士王毓宗顿首撰 晋右军王羲之书

云中朱建雄镌

吴郡吴士端集

我眉山铜殿法派 普行澄清海，智镜常照明。闻思修心德，觉遍性圆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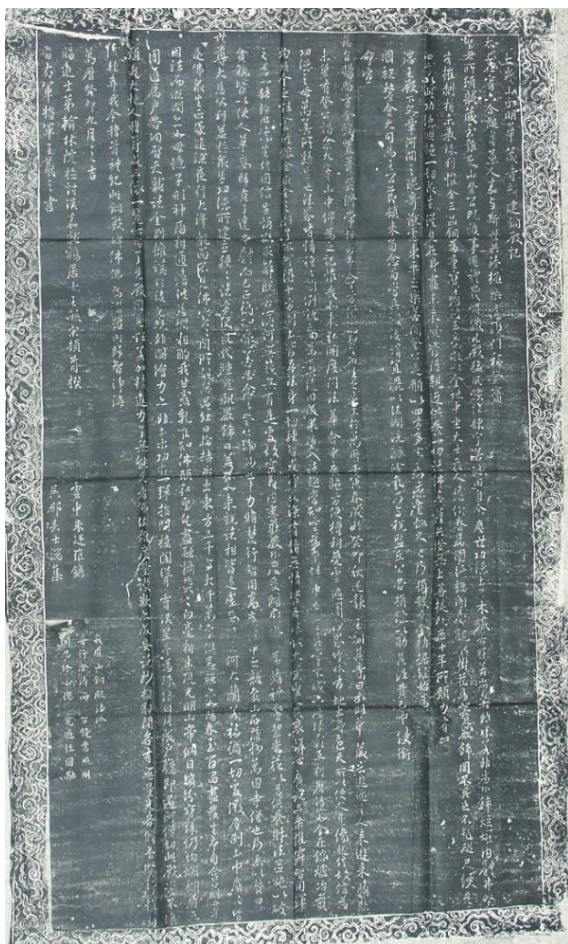


图3 《大峨眉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来自隅田正三，2008:35）



图4 《峨眉山普贤金殿碑》（来自隅田正三，2008:34）

四、《峨眉山普贤金殿碑》

赠进士第中宪大夫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勒提督学校前河南道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撰余读华严经，佛授记震旦国中，有大道者三。一代州之五台，一明州之补怛，一即嘉州峨眉也。五台则文殊师利，补怛则观世音，峨眉则普贤愿王。是三大士，各与其眷属千亿菩萨，常住道场，度生弘法。

普贤者，佛之长子，峨眉者，山之领袖。山起脉自昆仑，度葱岭而来也，结为峨眉，而后为分五岳。故此山西望灵鹫，若相拱揖授受，师弟父子，三相俨然。文殊以智入，非愿无以要其终，观音以悲运，非愿无以底其成。若三子承乾，而普贤当震位。蜀且于此方为坤维，峨眉若地轴矣。

故菩萨住无所住，依山以示相。行者修无所修，依山以归心。十方朝礼者，无论缁白，无闲远迹，入山而瞻相好，覩瑞光者，无不回尘劳而思至道。其冥心入理，舍爱栖真者，或见白象行空，垂手摩顶，直游愿海，度彼岸，住妙庄严域，又何可量，何可思议哉。

愿其山高峻，上出层霄，邻日月，磨刚风，殿阁之瓦以铜铁为之，尚欲飞去。榱桷栋梁，每为动摇。宅辛丑春暮登礼焉，见积雪峰头，寒冰涧底，夜宿绝顶，若闻海涛震撼，宫殿飞行虚空中。梦惊叹曰：“是安得以黄金为殿

乎！”太和真武之神，经所称“毗沙门天王”者，以金为殿久矣，而况菩萨乎。居无何，妙峰登公，自晋入蜀，携渾王所施数千金，来谋于制府济南王公，委官易铜于丰都石柱等处。内枢丘公，复捐资助之。始于壬寅之春，成于癸卯之秋。殿高二丈五尺，广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上为重檐雕甍，环以绣棖琐窗，中坐大士，傍绕万佛，门枋空处，雕画云栈剑阁之险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状。渗以真金，巍峨晃漾，照耀天地。建立之日，云霞灿烂，山吐宝光，涧壑峰峦，恍成一色，若兜罗绵，菩萨隐现，身满虚空。

呜呼，异哉。依众生心，成菩萨道，依普贤行，证如来身。非无为，非无相。大士非一，万佛非众。毗卢遮那如来，坐大莲华千叶之上，叶叶各有三千大千。一一世界，各有一佛说法。则佛佛各有普照为长子，亦复毗卢遮那如来，由此愿力成就。普贤大愿，即出生诸佛。宾主无碍，先后互融，十方三世，直下全空，亦不防历有十方三世。华严理法界，事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事事无妨碍法界，此一殿之相，足以尽摄之矣。大矣哉，师之用心也，岂徒一钱一米作福缘，一拜一念为信种哉。

师山西汾人，受业蒲之万固，后住芦芽梵刹，兴浮图。起住上谷，建大桥数十丈。兹殿成，而又南之补怛，北之五台，皆同此庄严，无倦怠心，无满足心。或成拂衣而去，无系吝心。是或普贤之分身，乘愿轮再来者耶。宅敬信师已久，而于此悟大道之无外，愿海之无穷也。欢喜感叹，而为之颂曰：

峨眉秀拔，号大光明。有万菩萨，住止经行。普贤大士，为佛长子。十愿度生，无终无始。金殿陵空，上势天宫。

日月倒影。万佛围绕，庄严相好。帝网珠光，重重明了。西连灵鹫，东望补怛。五台北拱，钟磬相和。

是一即三，是三即一。分合纵横，彰显三密。示比丘相，现宰官身，长者居士。

国王大臣，同驾愿轮。同游性海，旋岚长吹。此殿不改，寿同贤圣。净比莲花，六牙香象。遍历恒沙，威音非遥。

龙华已近。虚空不销，我愿无尽。

万历癸卯九月之吉

吴郡吴士端集

唐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褚遂良书

云中朱建雄刻

上述《大峨眉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与《峨眉山普贤金殿碑》为铜碑的正面与反面，正面碑文为汉嘉龙鹤

居士王毓宗（进士及第、翰林院检讨）撰。反面碑文为聊城名士傅光宅（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撰，刻铜碑为云中朱廷雄镌刻。隅田正三解说认为，解读清拓本时书法有诸多不能判读的地方。《大峨眉山永藏明华寺新建铜殿记碑》是“王毓宗撰，王羲之字体。《峨眉山普贤金殿记》是傅光宅撰，由明人集褚遂良书法字体而成。道光年间发生大灾，为此万历年间宝云和尚进行了重建。万历 31 年（1603）9 月吴郡吴士端集，峨眉山铜殿法派。这些拓本，是能海宽明治 32 年（1900）在中国四川省峨眉山登山后，在丽街购买取得。

可以认为，两碑拓本的价值在于是明人搜集到王羲之与褚遂良的标准字书，在文字书写上不仅起到了保存及延续，在书法价值上对后世书法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及字体比对、启示和借鉴功能。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的何绍基（1799-1873）参拜华藏寺及阅看铜碑后，作诗评价《永明华藏寺铜碑集王右军书，又有集褚书一碑，皆万历癸卯刻》：“钱一米作佛缘、一拜一念为信种。何况明珠字字光，照耀人天竞扶捧。右军汶领峨眉游，人足不来周益州。迟期乃以日为岁，惜哉此愿成悠悠。流传几千年韵，铸人青铜作山镇。例创怀仁《圣教碑》，碗脱檀模成祖印。弹指天花悟墨禅，瑶瑶台青琐更婵娟，菩提信种须传遍，历代代书家总善缘。”^①诗中怀仁《圣教碑》指怀仁集可能搜集到的字完成《怀仁集王圣教序》，内容是唐太宗为玄奘翻译的五部五十七卷经文的作序，题名《唐三藏圣教序》。

碑文中“登公，号妙峰，力修梵行。”说明峨眉山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关系。明后期的地理学家王世性万历 16 年游峨眉山后撰写《游峨眉山记》（1588）载：“《志》云，宝掌三藏千岁来自天竺，指其地为震旦第一山。”明礼部尚书李长春在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仲冬（1605）《峨眉山大佛寺落成颂并序》说“盖闻震旦国中，有道场三，曰峨眉，曰五台、曰普陀，鼎立宇内，为人天津梁。”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川提学江皋的《游峨眉山记》载：“峨眉为震旦第一山，天皇授道、普贤示现之所，神奇灵异，非复人间。”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峨眉山是印度佛教东传的一个重要场所，“礼普贤”成为一个参拜活动。曾经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宝掌和尚来宝掌峰建庵（后来的灵岩寺）修行，他曾经向南天竺高僧达摩求法得道。《峨眉山志·卷五》载：“晋千岁宝掌和尚，中印度人。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常不食，日诵般若等经千余卷。有咏之者曰，劳劳玉齿寒，似进岩泉急，有时中夜坐，阶前神鬼泣。”宝掌和尚结庐旧址的灵岩寺受到重视，《峨眉山志·卷六》载：“明英宗，勅赐峨眉山灵岩寺藏经勅书。”是一个中印佛教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地。除印度僧人宝掌和尚来此传法外，另外一个元代印度僧人指空，梵音为提纳薄陀（Dhyana-bhadra），意思为禅贤，指空在印度佛教史被尊崇为迦叶第一百零八祖。由印度到峨眉山礼普贤“坐禅三年”。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道场，普贤菩萨梵音为三曼多跋陀罗（Samantabhadra），

^① 【清】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338。

坐骑为六牙白象，晋隆安三年（399）慧持和尚修建普贤寺立普贤菩萨像来供奉。宋太平兴国五年（980）铸成普

同源的意

贤菩萨骑六牙白象的铜像，该寺明代更名为万年寺，由神宗皇帝御题名“圣寿万年寺”。峨眉山的吸引力，使得中西文化在此成为一个交融地。指空到峨眉山学习中国佛教后，使得他在中韩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僧人继业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回来后，在峨眉山修习传法，宋范成大的《峨眉山行纪》载：“牛心，本孙思邈隐居，相传时出诸山寺中，人数见之。此寺即继业三藏所作。业姓王氏，濯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965），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与遣中，至开宝九年（976）始归。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峨眉山的牛心指牛心寺，在《峨眉山志·卷1》载：“牛心寺，一名延福，唐慧通禅师，以山多回录，改为卧云，乃孙真人思邈修炼处。”《宋史·卷490·天竺国传》载：“（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继业就是其中一名出行僧人。继业前往印度求法历程的记录在随身的《涅槃经》中，范成大在牛心寺阅读记述为“所藏《涅槃经》1函，42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①范成大大对他的行记评价很高，抄录了《西域行程》辑入笔记《吴船录》书中，后人把继业行记更名为《西域行程》，对了解宋代中西陆地交通或丝绸之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妙峰和尚也是一位建筑家，曾在峨眉山（华藏寺，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宝华山（隆昌寺，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台山（显通寺，建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建铜殿三座，在三座山分别供奉普贤、文殊、观音菩萨。现存只有显通寺的铜殿一座，峨眉山华藏寺和宝华山隆昌寺的铜殿毁以火灾。关于铜殿的尺寸、精美的雕刻样态和材料在存留铜碑背面的《峨眉山普贤金殿碑》中记述为：“殿高二丈五尺，广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上为重檐雕甍，环以绣棂琐窗，中坐大士，傍绕万佛，门枋空处，雕画云栈剑阁之险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状。渗以真金，巍峨晃漾，照耀天地。”可以窥见明代制作铜殿的建筑技术非常高，另外，同时代的铜建筑，在西南地区仅仅只有“昆明金殿”留存至今，位于昆明北鸣凤山上的道教太和宫金殿，殿中供真武帝君，是由云南巡抚陈用宾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建，仿湖北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的样式。与峨眉山的铜殿建造都属于同时代，昆明金殿的样式对于理解明代建筑技术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华藏寺的铜制品只留存了两扇铜门、一座铜碑和一座铜塔。铜碑现在位于卧云庵，正面为集王羲之的字体，背面集褚遂良的字体。东晋时期王羲之（303-361），撰写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被世人所知。任职上永和七年（351年）出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所以他又称为“王右军”。《大峨眉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中，记述为王

^① 【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吴船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204。范成大笔记六种为《揽辔录》《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梅谱》《菊谱》。

右军，即王羲之。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位于峨眉山金顶主峰 3077 米处有华藏寺，全称为“永明华藏寺”。现在“铜碑”位于峨眉山卧云庵内，该碑是明万历年间由翰林院检讨王毓宗撰，铜碑中集王羲之之字体。对于王羲之之字体的留存集字及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羲之的真迹《兰序集序》自唐太宗埋葬后，就不知所终。出现了许多摹本留存至今。而以唐人五大摹本为正宗。现在，称为唐人五大摹本，虞本、褚本、冯本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黄绢本、定武本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般人很难窥见一下。相反，作为民间学习王羲之的真迹，华藏寺的铜碑起到了能够指引人们创造价值的功能。

能海的收藏本，晚清光绪 26 年（1900），在四川省峨眉山登山看碑后，在山下的街上购之。从保存至今的拓本样式，为整张浓墨，边饰有云纹。参看孔夫子网站有关老拓片《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的交易信息，有鉴定为民国时代的拓片，书法名家题签，纸张竹纸，刻印方式石印，装帧线装，尺寸 134 × 78 × 0.01 cm，是书家藏品之宝。能海的收藏本，未见题签与钤印。这个流传至今的铜刻拓本，国内应该还有证物，但笔者找寻不见。总之，拓本可以认为是明代整理的王羲之书迹的标准字书，是西南地区保存晋王羲之字体的重要物证。对于了解明代文人继承王羲之书迹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解读拓本，参照了程东等（1993）标注的《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和《峨眉山普贤金殿碑》。^①程注的《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中，未见“赐进士第翰林院检讨汉嘉就鹤居士王毓宗顿首撰，晋右军王羲之书。云中朱建雄镌。吴郡吴士端集。峨眉山铜殿法派：普行澄清海，智镜常照明。闻思修心德，觉遍性圆融。”碑尾有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关于明代吴门刻工的情况“吴郡吴士端”，吴士端为明代著名吴门刻工吴应沂之子。对于吴门刻工情况，程渤指出苏州古称吴门，明代时期的吴门，兼指苏州府管辖的范围，包括太仓、常熟、吴江、吴县和昆山。明时吴门刻工极盛，当时许多碑刻，均出于本地刻碑艺人的刀下，同田时吴门刻工也以工艺精绝著称（程渤，2014（5）：43）。^②刻碑工匠人艺人传承保存有集唐代字迹，铜碑文的制模铸成，也是反映了制作人避开石碑容易破损的倾向，希望能够用金属来永远保持这些字迹，以传承给后世。此外，碑末残留信息“峨眉山铜殿法派”，显示出了峨眉山道教临济宗的传承体系，能够明白峨眉山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圣地。

铜碑背面为《峨眉山普贤金殿碑》，是明万历年间担任四川提学官的傅光宅所撰，字为唐书法家褚遂良（596-659）的集字。楷书大家，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传世书法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本文撰写过程中就教于王弘毅先生，该碑字体有钟繇遗风，王羲之的行书从刘德升、曹魏时期钟繇一

^① 程东、薛冬《峨眉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173-180；180-184。

^② 程渤，《明代吴门刻工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5）：43。

脉继承而来。由于唐代时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不多见，后人所摹较多，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

清蒋超撰，民国印光大师重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峨眉山志·卷六》收录有《峨眉山金殿记》中未见“上势天宫”“净比莲花”，程东等标注的《峨眉山普贤金殿碑》中，未见“上势天宫”“净比莲花，六牙香象”。从这一点可以说，能海收藏的古碑帖拓本由于国内还未出现与之相同的拓本，暂且可以认识为“珍本”，虽然也有同类版本，但没有能海收藏的品相好。

碑文中出现梵文谐音多处，如碑文中出现四处“补怛”，“一明州之补怛”“补怛则观世音”“而又南之补怛”“东望补怛”，“补怛”是梵文 Potalaka，意译为光明山，观音菩萨之意。指补怛洛伽山，又有布呬落迦、补陀落伽、普陀洛等的翻译。另外，谐音兰若和檀，兰若梵名 Aranya，伽蓝之意，“檀”，檀为梵文悉昙字之“昙”谐音。悉昙梵文作 siddham，近似发音还有悉旦、悉谈、七昙等，含义为“成就”，每个字母都蕴含了一种力量，字称为“种子”，据《峨眉山佛教志·妙峰和尚》载：“明神宗朱翊钧之母慈圣太后赐金纸，各刺血写《华严经》一部，乃名满帝都。师以“大名之下，不可久居”，隐遁芦芽山建庵居住，太后派人访得，敕送《大藏经》至云南鸡足山。”《峨眉山志·卷6》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敕赐峨眉山永延寺藏经敕书。勅谕四川峨眉山，万佛金殿，敕建护国圣寿永延寺，住持僧福登，及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这个《大藏经》为《嘉兴大藏经》版本，传播到了四方的名山奥区。傅光宅参与了该藏的刻印工作，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禅宗曹溪憨山德清《绪言》说明，傅光宅精通佛理。关于《大藏经》的数量，计有 678 函，《峨眉山志·卷6》载：“佛氏藏经，旧刻六百三十七函。圣母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续刻四十一函。朕既恭序其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后，勅谕护持。所以锡孝类，流慈恩也。兹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传布之未广，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十五日。”关于鸡足山与峨眉山之间对于悉昙梵文化的来往交流，大理鸡足山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立了悉檀寺，是丽江土知府木增捐银修建，表示祝国诚心，请释禅来作主持。该寺在 1624 年得到天启皇帝的御赐藏经，1641 年还请回普陀山嘉兴藏一部。一个寺庙拥有两套大藏经，彰显其地位的重要性。这里的悉檀为悉昙的谐音，是滇人理解的发音，成为丽江土知府木土司笃信密教的一个参证，现在该寺只剩遗址。关于这个《大藏经》，另文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鸟虫书

四条屏风画中的字型类似鸟虫鱼的形状，呈现有蝌蚪状，包含有大草、金草和行书及隶书等的文字特征。壮丽的几个字体组合在一起，把文字用作装饰并且与画结合，形成画有字，字中有画的完美合璧，真正体现了书画幅宝品，虽然能海还未能判别是何种文字，但他已经把其列入了“珍本”范畴。隅田正三在研究这个拓本时，无法

断定“关于这个拓本，有知道详细情况，请告知能海宽研究会事務局。”可以说，能海收藏的鸟虫书，时代在清末以上，或者在明末，画中有文字说明“明末未开前。光绪戊戌之春见古柏”明末是 1645 年，光绪戊戌是 1898 年，时间上待考证。可以推断认为是一个瑰宝的“珍本”，是一个较稀有的原拓版本。有较高书法艺术价值和考证文字演变的历史价值。从书法艺角度，鸟虫文归于大篆，是文字历史的重要阶段，可以佐证西南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难以破译

从文字史来说，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出现的“虫书”“鸟书”“鸟篆”“鱼书”等，这些文字称为鸟虫书、鸟虫文、鸟虫篆。是南方地域吴、越、楚、蔡、徐、宋等国使用的一种文字，后来到战国晚期就不再是主流文字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认为秦书有八体“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之一的鸟虫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幡，当作旂，书旂，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节。”鸟虫书主要见于铜鼎、兵器的青铜器之铭文，如



图 5 鸟虫书（来自隅田正三，2008:31）

熟知的王子午鼎铭“越王勾践剑铭”等为代表，但如能海收藏品拓本的那样形态还不多见，是从那一个青铜器、木幡、碑石而来的拓本，未见实物例证，还有待考证。今天鸟虫书被保存在篆刻上，主要作为篆书用在刻章。王启龙通过鸟虫书的文化解读，从四个方面来认识鸟虫书，一是楚国青铜铸业的发达和工艺的精良为鸟虫书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楚地社会文化习俗是鸟虫书滋生的肥沃土壤。三是鸟虫书与楚画、楚舞、楚装饰纹样相映成趣。四是楚地固有的浪漫精神是鸟虫书久盛不衰的内在动力（王启龙，2013:244-250）。^①关于能海收藏品拓本的鸟虫书，对于探讨书体和古文字发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明正德状元杨慎居住在安宁时，破解湖南长沙岳麓峰上的岫嵎碑（禹碑）77字，这个文字唐韩愈认为字形如蝌蚪、鸾鸟、凤和蛟螭之形，如蕤叶之状，诗“岫嵎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刘禹锡看作是“螭虎形”，诗“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杨慎依照拓文进行了首次解读，在云南安宁法华山留下了镌刻的拓文及破译文。当然，杨慎的解读只是一种说法，至今还未有定论。段昕雍正九年（1731）重修《安宁州志》，在《艺文志·禹碑诗并序》中他认为：“嘉靖间，吾乡张碧泉抚蜀归，出榻本以示升庵先生，共七十七字，篆皆鱼龙文，人多不能晓。升庵乃象形会意，句为之释……，“禹碑”自是有全文矣。遂摹于法华寺后石壁，照原本镌之……。”^②把该文字看作“篆皆鱼龙文”，是象形会意的文字。对于今天破译鸟虫书有了很好的提示。

极少见的这四条屏风画鸟虫书所留下的信息对于鸟虫书书法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末画幅中已经指出，这个鸟虫书的构成“有虫书天然之文，非笔能书，非鑿可成。”蕴含“天然意趣其中”，也有“寄有法书秘写”。要学习该种文字只有学书者去“藉悟”，勤修在“丝蚕吐墨之方池中”。末尾幅的判别如下：“明未未开前。光绪戊戌之春见古柏，有虫书天然之文，非笔能书，非鑿可成。颇有天然意趣其中。寄有法书秘写，因命成四幅并题其中上碑，学书者藉悟，丝蚕吐墨之方池中。恂信题并书。”另外，三条屏风画有待进一步详考。

感谢：在本稿撰写过程中，得到能海宽研究会冈崎秀纪会长提供的资料，艺术家杨文、书法家王弘毅提供的书法指导，这里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日文）隅田正三，《能海宽带回的中国四川省拓本》《石峰》（2008（13）），岛根：日本能海宽研究会。
艾奇 1997，《禹碑探源》《安宁市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昆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安宁市委员会

^① 王启龙，《楚书法史》，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3:244-250。

^② 引自艾奇，《禹碑探源》《安宁市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安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189。

文史资料委员会。

程渤 2014,《明代吴门刻工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5)。

程东、薛冬 1993,《峨眉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 2002,《吴船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郭清华 2013,《武侯墓祠匾联集注》,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清】何绍基 1992,《何绍基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

李兆成 2009,《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沿革考(一)》《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清】潘时彤著,李景焉、卿三样笺注 2012,《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七·艺文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谭良啸 1987,《成都武侯祠的“三绝碑”》《四川文物》,1987(3)。

王晓乔 2017,《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后代题刻初探》《四川文物》,2017(4)。

王启龙 2013,《楚书法史》,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宋】祝穆撰,《方輿胜览·卷51》。

《中国金石总录》(www.ch5000.com.cn),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